

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中的类比转义

程丽蓉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转义(trope)和类比(analogy)是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的核心逻辑,是对男权主义传统的“性类比思维”进行逆向类比推理,从底层思维逻辑质疑二元对立模式,受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思想学术界研究范式转型的深刻影响。以“个人的即政治的”理念变迁、伍尔夫叙事的价值之争、对《笑忘书》的意识形态阐释为例,可见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从理念、理论批评到阐释案例不同层面以类比转义方式解构“二元对立”。借助类比转义,女性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阐释得以深入揭示类比叙事、二元对立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深层社会意识和文化符码,但也可能因推理方式本身的缺陷出现主观偏误。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类比转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1)06-0023-09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1.06.003

艾布拉姆斯的名著《镜与灯》序言曾解释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在了一起”“以‘镜’概括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以‘灯’代表浪漫主义关于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1]序言4},是因为他发现,“历史上的批评论争很大程度上都是类比性质的论争”,批评概念“并非获自对审美事实的简单考察,而似乎是从那些有益的类比物中发掘出来的。这些类比物的属性由于隐喻性的转义而成了艺术作品所固有的属性”^{[1]序言4}。以考察这种类比转义的批评隐喻为核心,以“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四要素为坐标,他建立起了影响至今的文论体系。艾布拉姆斯这种透过纷繁文论现象直击底层思维方式和基本思维模型的方法对于我们观察女性主义叙事阐释的研究方法极富启示意义。

在女性主义叙事阐释中,转义(trope)和类比(analogy)也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推理方式,特别是在女性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阐释中,常见到trope(做动词和名词),analogy或analogically这种表达。当代

收稿日期:2021-07-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性主义叙事学阐释方法研究”(17BWW003)

作者简介:程丽蓉,女,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小说及叙事理论比较研究、艺术与传媒、性别与传媒跨学科研究。

认知语义学指出,“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比喻)”^[2]这类语言使用涉及(话语)推理中的常规运算,尤其在人类文化进化演变进程中,原始思维总是由具身认知出发推及他物的。性别和性别关系乃是人类最基本的具身认知,性别和性别关系自然成为认知体系和逻辑推理体系中的基础。女性主义理论批评和叙事阐释所揭示的,正是人类文化传统在男权主义主宰和控制下被严重扭曲了的感知、认知、逻辑理路和观念体系及其叙事策略和叙事再现。埃尔曼的《思考女人》(1968)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渗透着一种现象,即“性—性类比思维”,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人们总体的思想倾向就是“根据我们最初的简单的性别差异来理解所有的现象,不管这些现象是如何变化的;以及……通过性类比对几乎所有的经验进行分类”^[3]。托里·莫伊进一步指出,这种思维习惯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不仅性的术语,而且性的观点都被强加给外部世界,所有的形式都包含在我们对男女性情的概念中,埃尔曼这篇文章就揭露了这种性类比思维方式的荒谬和不合逻辑的本质^[4]。

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与叙事阐释根本质疑“性别”身份和“二元对立”逻辑,正是对男权主义性别文化传统进行逆向类比推理的结果,努力从底层思维和逻辑起点上发起挑战,这一点尤其在女性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阐释中得以凸显,成为女性主义叙事阐释意识形态研究方法的核心逻辑。文章即从“个人的即政治的”理念的所指变化,围绕伍尔夫论争而进行的解构性别二元对立的理论抗辩,以及典型案例《笑忘书》的意识形态阐释等三个方面,从理念、理论批评到阐释案例三个层面,考察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中类比转义的运用,揭示其变革意义,辨析其思维局限。

二

女性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阐释其理论方法首先基于对“意识形态”和“政治”这两个基本概念的移用与改造,使“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一女性主义理念不断迭代。在这个过程中,类比转义逻辑运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德特雷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为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所著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将之界定为研究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发生、发展规律与普遍原则的学说。从启蒙运动到后现代时期,“意识形态”经由包括叔本华、尼采、马克思、阿尔都塞、卢卡奇、葛兰西、布尔迪厄以及众多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和批评家的符号衍义,早已超出政治范畴,成为一个意义庞杂混乱的概念。特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导论》辨析了围绕此概念发生的著名论争,梳理了若干种“意识形态”概念^[5],并将这些概念简要划分为主流和另类两条路径: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到卢卡奇和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中心谱系一直专注于真假认知问题,把意识形态当作是病态的、扭曲的和神秘的;而另类思想传统则更接近社会学而非认识论,更多关注社会生活中思想的作用,而不是这些思想是否符合现实^[6]。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不可逆转的、划时代的变革”^{[7]136},把意识形态看作是渗透在社会机体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微观政治事件”,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的自我意识,“所反映的不是人们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7]230},意识形态机器发挥作用的方式是把个体质询为主体。伊格尔顿进一步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指出“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8]27-28},语言中凝聚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内容,文学文本作为语言系统,其意识形态首先从语言的层面上体现出来^{[8]28}。

尽管“意识形态”概念含义芜杂,其实质仍未远离对现实政治的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经验再现,与“政治”概念联系密切。阿尔都塞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被女性主义理论融合进来,成功迭代了“政治”概念。

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政治”有不同的表述,其核心在于政治是与社会阶级阶层或团体利益、权力分配相关的那些实践活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提出“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一重要口号。这一口号源自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中提出的主张:“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他提出“社会学想象力”,即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关系”,这种能力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区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9]。女性主义者将此理论类比转义,用于表达性别化的个人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以揭示父权制度下女性所遭受的“个人的”处境和伤痛正是性别权力的系统性、体制性不公造成的。

盖尔·鲁宾的名文《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10]呼应“个人的如何是政治的”这一问题,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这一重要命题。在与马克思、恩格斯、列·斯特劳斯、弗洛伊德、拉康等人进行理论对话的基础上,她论析了性/社会性别制度如何直接体现为婚姻、家庭与亲属关系制度,并与政治经济制度交织在一起。她指出,在文学文本中,家庭、婚姻、恋爱等最“日常”和最“个人”的经验被反复书写,看似远离意识形态,实则渗透着意识形态,这样,文学的个人日常经验书写就从经验、文本、个案被提炼上升为理论、制度和社会架构,显现出其论述的“政治化”过程。

米莱特也将“政治”概念类比转义到性别问题研究,将之界定为“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而两性之间的关系延续着“一个集团按天生的权力统治另一集团的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格局”^[11]。她接续了伍尔夫和波伏瓦对于女性“第二性”处境的论述,揭示出性别压迫的普遍性和荒谬性。托里·莫伊这样评价米莱特的贡献:“在对新批评的勇敢对抗中,米莱特指出,要真正理解文学,就必须研究其社会文化语境,这一点为后来的女性主义者所共识,无论她们的兴趣点有多大差异”^{[4]23}。不仅如此,米莱特还极大地挑战了传统文学批评的“作者权威”,揭示出(尤其是男性)作者/文本与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如何暴露出作品的预设前提。她发现,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对男权主义文本可以进行抵制性、对抗性的阅读,“这种方式摧毁了以往普遍存在的读者/批评者只是权威话语的消极的/女子气的接受者形象”^{[4]24-25}。

在《批评与社会变迁》(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一书中,弗兰克·伦特里基亚(Frank Lentricchia)类比转义运用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论,对“个人的即政治的”提出了另一种解读和表达。她把“政治”定义为“保守(现状)与激进(变革)之战的再现”^{[12]1-155},个人欲望因此而被放置于更大的文化整体之中,这样,个人的政治就变得难以抵抗。这种旨在变革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其目标在于“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作为一种修辞和对过去与现在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邀约我们去塑造某种特定的未来,邀约我们去实践,而不是认知”^{[12]1-155}。她认为,文学就是这种保守与激进之战的“再现”。伦特里基亚的“政治”理论包括了政治的实践性、修辞性、时间性以及个人与文化整体的关系等内涵。

芭芭拉·J·埃克斯坦(Babala J. Eckstein)的《痛苦世界的小说语言:作为悖论的阅读政治》(The Language of Fiction in a World of Pain: Reading Politics as Paradox)也从女性主义角度提出了另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观念。她认为,“政治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利用语言来制造权力”,这种权力是声称自己不是他者(的个人或集团)对于那些被认为是他者(的个人或集团)的权力^{[13]8}。她不赞同把政治仅仅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更为广泛地吸纳包括福柯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众多理论路径——“女性主义致力于对既有秩序进行结构性变革”“女性主义的途径是开放的,有时是弗洛伊德主义,有时是马克思主义,有时是乌托邦的。不过,无论是在私己家庭还是公共建筑这样的政治结构内外,女性主义都常常是解构主义的”^{[13]17},揭示出“政治”表面看来不存在而实际却无处不在,这为解读文学政治提供了一种途径和视野。她援引米兰·昆德拉《笑忘书》后记所言“男人的形而上学在私己领域与在公共领域是相同的。政治揭开了私己生活形而上学的面具,而私己生活也揭开了政治形而上学的面具”^{[13]18},指

出,我们所意识到的私人生活的私己状态是已经被政治所决定了的。埃克斯坦运用“社会学想象力”,将之类比转义用于表达关于女性/男性个人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的观察与思考,从而迭代了女性主义“个人的即政治的”观念,揭示其与“政治的也即个人的”之间的互动转换关系。

“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一理念的变迁既呈现为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逻辑推衍,当然也受到思想界和学术界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语言学转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兴盛以及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崛起形成的学术研究范式转型的深刻影响。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开启了解构思想的大门。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方法通过将生物、社会、文化、语言和历史结合起来,从个体观察群体和人类,从个案出发探究民族性和人性,以列·斯特劳斯的《图腾制度》、维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的《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奥德利·理查兹(Audrey Isabel Richards)的《祈颂姑——赞比亚本巴女孩的一次成人仪式》等为代表的大批人类学著作陆续问世并形成广泛学术影响。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弗雷泽的《金枝》就专门考察和讨论了人类的类比思维及其演变问题。到1980年左右,一群关注民族志写作问题的学者出版了《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论文集,对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进行了反思,民族志的客观性被怀疑,民族志的意义和评判标准被要求重新评估,民族志写作中个人叙述和非个人性描述之间的重要关联得到揭示。与此同时,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也转向对被压抑和被规训的个体人的高度重视,从福柯、布尔迪厄到美国“新文化史”代表人物彼得·伯克、林·亨特、娜塔莉·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罗杰·夏蒂埃等人,开辟了以物质文化(如食物、服装)、政治文化、身体和性别、记忆、形象和想象为对象的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以具有独特个性的具体的个人,而不是以类型化的群体为叙述的中心,揭示其同客观条件和外界事件的关系。处于当时社会思想和学术研究风暴中心的女性主义无疑与这种思想和研究范式的转型形成了强烈的呼应,“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一社会学观点也就自然融入女性主义理论之中。

三

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曾指出,“叙述寻求建立这样一种身体符号学,把身体标记或铭刻为一个符号学的、叙述的符号”^[14]——叙事与身体的符号表达之间总在寻求同构与共谋的关系,二者之间以类比转义为桥梁,衍射出女性主义以叙事解构身体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和符号象征秩序的思维方式。这种解构思维不仅体现在解构私人/公共之间的二元对立,也解构几乎所有的二元对立,在德里达、巴赫金、克里斯蒂娃以及福柯等人的理论武器助力之下,致力于反思理性、差异、主体性等问题。女性主义对男权文化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始自弗吉利亚·伍尔夫对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解构,而后以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身体写作”和符号学理论,以类比转义方式将之延伸至语言、符号等文化领域的其他二元对立模式。围绕关于伍尔夫的争议,托里·莫伊站在克里斯蒂娃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立场,针对肖瓦尔特的观点为伍尔夫辩护,运用以类比转义为底层逻辑的意识形态阐释方法,深入解析了伍尔夫叙事以“解构二元对立”为核心的女性主义思想内涵与价值。

伍尔夫的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三个基尼》以及小说《到灯塔去》《达洛维夫人》《奥兰多》常常被作为女性主义理论批评和叙事阐释的焦点对象,讨论最集中的话题莫过于伍尔夫在其中表达的对于后来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影响深远的原创性理论与叙事方式,即“双性同体”性别观与以意识流为外在表征的解构主义叙事方式。正如汉德礼(Willian R. Handley)所说:“她(伍尔夫)的叙事实验其效果和功能显然都是政治的”^[15],她的书写风格和结构总与其女性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融为一体。托里·莫伊就认为,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回应了伍尔夫《到灯塔去》对强大的似乎永恒不变的性别身份形而上学信仰的解构。她解析了克里斯蒂娃论述的类比逻辑,揭示出伍尔夫的书写是如何实现其独创性的解构主义叙事与性别观达成同构的^{[4]13-15}。

克里斯蒂娃在其《妇女的时间》(Women's Time)中曾从历史和政治角度将女性主义分为三种:一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女性要平等地进入象征秩序;二是激进女性主义,主张女性应以差异之名拒斥男性象征秩序;三是她自己所持的立场,即女性应拒绝把男人/女人二元对立作为形而上学,解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对立,因而也就必然挑战“性别身份”这一提法^[16]。克里斯蒂娃提出“异质性”理论,认为“异质性”作为意指实践的驱动力形式,表现了前符号态的非象征化生命冲动和本能欲望的原始特殊性,它同时强调客观世界异质元素的不可归纳性、不可概括性和不可取代性,“显现了意义多元话语模式的真正基础”^[17]。她的性别“符号”概念不同于一般符号学的符号(象征, symbolic)概念,后者对应着那些意味着较严格的、精确之含义的词语,而前者则是一个情绪范畴,受制于我们的本能,本能存在于语言的裂缝和韵律中,而非词语的外延含义中。正如她的《诗学语言的革命》^[18]所论,现代主义诗歌构成了革命性的写作形式,其突然变化、省略、中断和明显缺乏逻辑建构,是一种体现着身体和无意识的节奏的写作,它成功地突破了传统社会意义的严格的理性防线。这种传统的社会意义是维持整个象征秩序——所有人类的社会和文化机构的结构,因此,现代主义诗歌中符号语言的碎片化,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革命,也预示着一场全面的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对克里斯蒂娃而言,存在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其本身就是“革命性的”,与性和政治变革是类同的,其存在证明了从内部改变正统社会的象征秩序的可能性。莫伊指出,伍尔夫拒绝致力于所谓的理性或逻辑写作形式,就跟性、政治变革以及这种特殊的写作实践一样,是对象征符号类似的突破^{[4]11}。莫伊批评肖瓦尔特以男权主义传统的确定性(作者、读者都遵从男权主义式的“自我—他者”统一的个人和确定的视域)文学标准对伍尔夫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进行了错误分析。她指出,伍尔夫拒绝隐藏在男权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她“绝不是因恐惧而逃避其性别身份。伍尔夫拒绝性别身份是因为她看透了其实质。她已经理解女性主义抗争的目的必须是解构这要命的男性/女性二元对立”^{[4]9},她的“双性同体”说与其说是要整合男性和女性气质,毋宁说就是为了解构二元对立。

在批评肖瓦尔特对伍尔夫的解读时,托里·莫伊指出,文学文本对于不统一的个体人自身的探索,或者对于性别身份的探索,或是对文学作品“文本性”的探索,都只是其以简化繁的方式。如果不深入去解析作品的叙事策略,就几乎等于没有读过此作品,“只有通过解析文本各个层面的叙事策略细节,我们才能以准确的语句准确地揭示出真正形成这个文本的矛盾冲突和结构布局”^{[4]14}。伍尔夫拒斥理性的逻辑性的写作形式,采取非线性逻辑的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写作,就是打破了克里斯蒂娃所说的包含整个人类社会文化象征秩序的传统结构,而建构了一种与现代社会整体变革相一致的碎片化的象征性语言。许多学者,如凯瑟·梅泽伊(Kathy Mezei)、美尔贝·库迪·凯纳(Melba Cuddy-Keane)等人,专门研究了伍尔夫小说中自由间接引语这一叙事策略的运用,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佐证了托里·莫伊为伍尔夫所做的辩护。^①安娜·斯奈斯(Anna Snaith)指出,“伍尔夫所做的是琳达·哈琴所说的‘后现代非自然叙事,既呈现又颠覆叙事传统’”^[19],她揭示了客观的全知全能叙事者的人为性,而不是为了弥补其经验之不足。伍尔夫选择女性叙事者,并非如弗里德曼所说是由于女性本质上就是逃避的,而是因为传统上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叙事权威都被塑造为男性。伍尔夫特意在一些文本中把一些私人因素加入叙述者声音中,以改变公众/私人的二元对立,这就产生了身份、再

^①MEZEI K. Who Is Speaking Here?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Gender, and Authority in Emma, Howards and Mrs. Dalloway; KEANE M. C. The Rhetoric of Feminist Conversation: Virginia Woolf and the Trope of the Twist. 凯西·梅泽伊:《含混的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与英国女作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66-92、137-161页。

现和性别问题。^①可见,正如金斯堡(Ginsburg)所言,“自由间接话语作为一种叙事方式所引发的问题是文本关注的中心主题。因此,不要把自由间接话语看作是仅仅传达某一内容的任意形式,它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本身具有内容的形式,而且这一内容与文本主要主题相关”^[20]。

从伍尔夫到克里斯蒂娃再到托里·莫伊在叙事、理论及批评阐释各个层面对于男权主义二元对立逻辑的反抗和解构可见,女性主义叙事策略绝非任意随机的选择,或逃避身份处境的刻意选择,而是对女性、私人等边缘处境和传统男性叙事权威和公共话语传统有着深刻体验,既不得存在于男性权威的叙事传统之中,又不断地尝试以各种叙事方式进行抗争。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与阐释同样如此,既不得不采用西方文化惯用的“性/性别类比思维”逻辑表达,又利用这种逻辑为女性主义思想和叙事策略辩护。

四

不仅如此,借助类比转义推理方式,女性主义叙事阐释意识形态研究还注重解构和剖析在看似“确定”的“二元对立”叙事表层之下,叙事内层存在的诸多差异性、动态性和“非确定性”(uncertainty),其叙事内层本身也采用了类比叙事方式,从叙事结构、叙事话语、人物关系隐喻等多个层面解构男权传统的理性主义和专制权力。埃克斯坦的《痛苦世界中的小说语言:作为悖论的阅读政治》就采用这种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方式,深入地阐释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笑忘书》(The Book of Laughing and Forgetting)中的类比叙事。

埃克斯坦的论述从引用分析1949年捷克教育部长在作家联盟会议上的讲话开始。这个讲话突出强调文学“work for us and work against us”这一对相互排斥的政治立场,且这一立场是确定无疑的。以若干例证为据,埃克斯坦指出,就连那些擅长解构二元论的行家也常常难以抵御相互排斥的二元对立的诱惑——设立对立双方且此对立具有确定性(certainty)。解构主义则完全不同于这种二元对立论,既暴露出文本或自我内部的差异性,又揭示了不确定性的政治和伦理效力。昆德拉小说采用不同价值系统之间对话这一形式,分析和彰显出内部差异性,从而使解构主义与严肃政治和谐共处,重新赋予受到捷克政治的意义专制严重打压的多元化阐释以价值^{[13]46}。运用“政治/性别/自我/文本”之间的类比和转义推理,埃克斯坦集中讨论了昆德拉小说中的对话问题,包括对立之中的内部差异,政治操控中的确实性(authenticity)与权威性(authority),以及文本中各个层面的“二元对立”的表面确定性和内层非确定性。

“昆德拉最精心制作的确实性(authenticity)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他反对抒情而执着于反讽,对感情的价值持深刻的怀疑态度”^{[13]48},确立了“抒情/反讽”这一二元对立,并确定小说的抒情会贬低反讽的价值。正如感情与真相之间存在很大距离(自我内部之间存在很大距离),反讽式的抨击也不具有确实性^{[13]48}。《笑忘书》的叙事策略就是,打破敌人/盟友的二元对立,揭示出敌人和盟友内部存在差异,而这种内部差异又使二者之间的差异变得非常复杂,这样,反讽对人物和文化之罪的抨击才具有了确实性。昆德拉的《笑忘书》正是从自我和文本内部去探索差异的范例。

埃克斯坦细致分析了《笑忘书》中“笑与忘之间存在着由于这二者各自内部差异而导致的复杂关联”^{[13]49}:初读《笑忘书》会认为它只不过是“笑与忘”这一主题相关的一些无关联的故事的组合,反复“重读”之后,才会发现,事实上,“笑与忘”在此书中并非如“战争与和平”或“红与黑”那样的二元表达,

^①SNAITH A. Virginia Woolf: Public and Private Negotiation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79-80; FRIEDMAN S. Spatialization, Narrative Theory, and Virginia Woolf's The Voyage Out. 凯西·梅泽伊:《含混的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与英国女作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109-136页。

《笑忘书》的形式本身就与这些小说有别。她指出,“对《笑忘书》整体形式的探索会从历史到小说再到理论关联起来,会把一个个故事也联系起来,昆德拉创造了一个如处于多种路径背景中的照片一样的辐射系统式的小说文本,其中同时包含着个人的、政治的、经济的、戏剧的、日常的和历史的种种内涵”^{[13]50}。

接下来的文本细读分析循着这样的理路:“丢失的信”(遗忘)—擦除(erase,德里达)与消失/记忆之间的悖论—政治事件记忆/政治论争记忆,每一个环节都同时包含着政治/个人两种内涵。她发现,小说设置了这样的“类比叙事”,即《笑忘书》的作者“米兰·昆德拉”与小说中的日记作者米雷克之间的类比:“我”自称米兰·昆德拉,在讲述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写作《笑忘书》。在小说一开始,他就把他的角色米雷克比作一位被剥夺了推翻热德娜的权力的作者。“他是公民和人,她是国家和权力。他也是遗忘(或想遗忘),而她就是记忆”^{[13]53},他们喻示着作者/国家之间的对立,与(“我”)书写/(米雷克)遗忘,(米雷克)遗忘/(热德娜)记忆类比构成了一组对立“二元”。

小说还有另一组重要的对立“二元”——在场/缺席。小说中的“作者昆德拉”与他的“人物”米雷克对于热德娜在场/缺席的分歧,米雷克和朋友们被投入监狱,他们个人的生活目的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冲突,造成了他们个人既缺席又在场。在修辞层面上,米雷克的故事重现了小说开始部分“克莱门茨的帽子”照片的伦理——文本与其自身、米雷克与其自我相区别开来,“克莱门茨的帽子”这个高贵者既在场又缺席。“在场/缺席”这一组二元在小说中也有多重衍义:对于米雷克是“丢失的”信/对于热德娜是“拥有的”信;警察找到的信/后代丢失的信;情书(私人感情信件)/政治信件;警察找到信/读者失去信(不知到底是情书还是政治信件被找到);信所处的位置(能指)/信的内容(所指)。埃克斯坦由此所做的类比推论是:《笑忘书》中这个找信的过程,既表明了语言是如何运作的,又表明了权力是如何运作的^{[13]55}。文本还设置了“二元结构的重现”,“丢失的信”中的二元结构重现在小说第四章——记者塔明娜想要找回丢失的信,以记住她与现在病中的丈夫之间感情的点点滴滴。塔明娜和米雷克这两个人物都因“丢失的信”而从属于某种关系网络,而信的内容或是记不得了或是无法控制。塔明娜与米雷克之间有诸多不同之处却又具有根本的共同点,即他们都因丢失的信而承受政治后果。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不是信的内容,而是信的在场或缺席^{[13]57}。

到此为止,埃克斯坦都在分析《笑忘书》中的“确定性”部分,其间也不断在揭示其内部的差异性,也就是不稳定、不确定之处。有了这一铺垫,论述开始转向深度剖析文本的深层“不确定性”。回到小说开头,关于塔明娜,小说写道“我的女主人公属于我,只属于我一个人”^{[13]57},塔明娜要想让自己的生活被“人类”所理解,就只能将其简单化(呼应小说中的昆德拉采访录)。“真实的作者”昆德拉曾说,“写作的人要么是全部(对他自己和他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宇宙)要么什么也不是”^{[13]57}。因此,“‘作者昆德拉’越多书写自己,就越多区别于自己,他越表明塔明娜的重要性,她就是丢失的信,就越表明他内在的差异性。他越是想赋予塔明娜以固定的意义,就越是对所有的写作绝望。《笑忘书》就成为一种明证,即信件是历史和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的成因,也是作者与读者关系、作者自身与读者自身关系的成因。”^{[13]58}作为“人物”的米雷克和塔明娜与“作者昆德拉”就存在这样的同构关系:人物是作者展示文本和文本作者自身内部差异的手段,具有强烈的符号意义。塔明娜代表的是人类的私密身体,米雷克代表的是政治的公共身体,都是形而上学的不确定性的一部分^{[13]58}。而塔明娜与“作者昆德拉”的关系/“作者昆德拉”和读者/死去的克莱门茨的形象之间,又构成相互合谋或同构叠合关系。

前述种种类比延伸的同构叠合关系集中投射在了文本中的“性别”议题。“母亲”是《笑忘书》中的变奏主题和塔明娜缺席的体现。“母亲”主要出现在第2部、第6部,这两部分具有对称性,二者互为镜像,将反射和立面、同者与他者折叠在一起,喻示了父亲/母亲—文化/自然这组二元^{[13]59}。玛科塔和卡洛儿是一组典型的昆德拉式情侣,相互爱恋又相互折磨,玛科塔滥情而卡洛儿妒忌,这组“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者同时是这对情侣的情人的夏娃,她的存在模糊了男女二元对立。母亲、玛科塔、卡洛儿、夏娃之间的母子关系、男女关系、女人之间的关系存在性别和性悖论,与前面的政治和语言悖论构成类比,三者又都是记

忆辐射作用的结果,因而也就解除了这几组关系的对立性。埃克斯坦指出,《笑忘书》中的政治是身体、性、性别、母性和国家的政治,每个人都面临死亡的专制和生命的不确定性,以此类推,政治、历史、理论、小说、性等,都存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内部差异,存在不确定性^{[13]65}。

埃克斯坦对《笑忘书》的叙事阐释从剖析文本的基本思维和底层逻辑入手,揭示其类比和转义结构中包含的政治/文本/性别意识形态,以及这种看似“确定”的结构内部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由此而解构政治/文本/性别中暗含的悖论,并指出这种悖论与“通过身体思考”这一女性主义思想的相通性。埃克斯坦的论析揭示了小说无处不在的性别/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构类比关系,“确定”的“二元对立”和“二元再现”表象后深藏着“不确定性”,这才是昆德拉对于政治/历史/文本/性别/自我/作家/读者/人物等诸多相互关联问题进行深层转义和类比表达的哲理诉求。埃克斯坦的研究具有双重意义:她利用的是类比转义的推理结构框架,糅合了女性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和意识形态理论,同时,她又用这种方式去观察和剖析《笑忘书》这个男性作家创作的文本中贯穿始终的同构类比关系,类比转义在这里既是研究者的武器,又是她的研究对象,前者是逻辑推理,后者偏重于思维方式、思维习惯及由此而来的深层叙事结构。作为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和文学教授,她的研究本身作为女性主义叙事阐释研究的个案也暴露出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类比转义推理的悖论性。

五

当代女性主义早已不再只是争取男女平权,或是追求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和社会模式,而是从根本上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范式、新的性别模式、新的话语体系,解构和颠覆逻格斯中心主义和二元论逻辑的形而上学传统,重新定义性别和性别意识,试图重构新的包容的多元叙事逻辑^[21]。不仅如此,女性主义也因此而重构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借助转义类比的方式,将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推衍至诸多被主流文化贬斥为边缘、他者、异类的问题领域,视理性传统为男权主义的专制权力,因为“理性时代就是确定性的时代……虽然每个时代都会制造神话和偶像,或者反理性传统的激进人物,但理性及其确定性仍然是阐释权力的主导系统”,“确定性(certainty)需要神话,大量的话语又提升这些神话。政治即文本,而确定性即权力,权力传统上都是来自对自我与他者的确定分割”^{[13]22},种族、性别等前述种种边缘概念都是被这种“确定”自我和他者的“差异”制造出来的。正由于此,以依丽格瑞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才着力提倡“差异之美”,提倡建立一个强大的女性象征体系,用以再现性别差异中原本被他者化的女性一方^[22]。

女性主义思想、语言和思维方式在叙事文本中的渗透和运用不仅仅催生出新型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在性别矛盾与性别权力视野下,各种叙事要素之间的权力关系与性别权力关系之间形成了类比,极大地改变了叙事话语的面貌。这反过来使得女性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阐释能够敏感到无论男女作家的叙事文本中的深层社会意识、思维习惯和文化符码,比如类比叙事、二元对立“确定性”的虚假、“非确定性”的普遍存在。这种方法往往能使女性主义叙事阐释如托里·莫伊和埃克斯坦的论述那样鞭辟入里,在叙事分析中彰显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因而成为女性主义叙事阐释方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思维局限。从莫伊和埃克斯坦的论述来看,他们虽然对“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及其类比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构,但又导向偏激,即将研究对象所呈现出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单纯归诸某一女性主义理论影响,如埃克斯坦把米兰·昆德拉对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颠覆性书写归诸“通过身体思考”这一女性主义“分析政治”的激发作用^{[13]64-66},这就有失偏颇。这种急于将论析收束到一种女性主义观点或理论的做法,透露出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批评可能会产生先入为主、以理论前见框定叙事文本分析的主观偏颇,这是我们在实践中应该特别注意要避免的。

同时,我们也应清楚,作为早期人类原始思维的遗存,类比推理是或然性推理,结论并不确定,类比推理的事物之间一定要有确实的映射关系,避免陷入主观臆断的误区。

参考文献:

- [1] M·H·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 郇稚牛,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2] LAKOFF G, JOHNSONS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8-34.
- [3] ELLMANN M. Thinking About Women[M]. New York:Harcourt, Brace & World,1968:6.
- [4] MOI T. Sexual/Textual Politics[M]. New York:Routledge,2002.
- [5] TERRY E.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M]. London: Verso Publisher,1991:1-2.
- [6] TERRY E. Ideology, Fiction, Narrative[J]. Social Text,1979,2(2):62-80.
- [7]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8] 伊格尔顿.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 文宝,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9] C·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 陈强,陈永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6.
- [10] 盖尔·鲁宾. 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M]//王政,杜琴芳.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1-81.
- [11] 凯特·米莱特. 性政治[M]. 钟汉良,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6-38.
- [12] LENTRICCHIA F. 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1-155.
- [13] ECKSTEIN J B. The Language of Fiction in a World of Pain:Reading Politics as Paradox[M].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0.
- [14] 彼得·布鲁克斯. 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 朱生坚,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0.
- [15] HANDLEY W R. Virginia Woolf: The Politics of Narration[M]. Redwoo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3.
- [16] KRISTEVA J. Women's Time[J]. Signs,1981,7(1):33-34.
- [17] 范海敏,高宣扬. 异质性:论克里斯蒂娃意义生成的多元逻辑[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22-128.
- [18]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诗性语言的革命[M]. 张颖,王小姣,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1-199.
- [19] SNAITH A. Virginia Woolf: Public and Private Negotiations[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79.
- [20] GINSBURG M P.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A Reconsideration[J]. Language and Style,1982,15(2):133-149.
- [21] 倪志鹏. 女性主义知识考古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4-12.
- [22] 刘岩. 差异之美: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序言7.

Analogical Trope in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Feminist Narrative

CHENG Li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rope and analogy are the key logic of the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feminist narrative, in reverse to the traditional “sex analogy thinking” of masculinity, and they question the binary pattern from the bottom thinking logic.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of “the individual being the political”, the contestation of value of Woolf’s narrative, and the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Laughing and Forgetting Book”, it is found that feminist theoretical criticism deconstructs “binary opposition” with analogy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concept, theoretical criticism and cases. With the help of analogical trope, the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feminist narration can reveal the deep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codes such as analogical narration, binary opposition of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but subjective errors may also occur due to the defects of the reasoning mode itself.

Key words: feminist narrative;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alogical trope



(责任编辑 杨文欢)